

马华文学： 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变奏

何国忠

1、中国意识和马华意识

单就字面来说，马华文学的“华”可以指华人，也可以指华文。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于和这个概念有关的讨论都是集中在以华文创作的华人圈子里，延续下来，“华”作为华人和华文结合体，就成为许多作家根深蒂固的观念。

马华文学的概念被提出来，是极为自然的。中国作家南来，住了一段日子，不免会“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世界里去。”^①“马来亚文学”的用语在1934年到1936年间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出现了。^②但是较深入地讨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问题，即将焦点放在“马”，则发生在1947年和1948年之间。在那次的大论争里，文人针对文学作者应该关心中国或马来亚大

何国忠博士 现任马来亚大学东亚系讲师。

① 金燕：〈浪漫南洋一年的“荒岛”〉，《新国民日报》“荒岛”副刊，1928年2月2日，收录于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第10集（出版史料），页100。

② 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页14。

做文章。一边是支持母国的文人，这些文人鼓吹侨民文学；另一边则是对本区域渐生感情的文人，提倡以本土为内容的文学。^③在两者不同的诉求间，争论点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论者泄露出他们的正统儒家心事，强调文学的作用和目的。也因为如此，论者固然可以是和文学有关的作者，也可以是和文学无关的作者。由于论者在意的是创作者的道德动机，争论点因此显而易见不可能出现美学或理念上的典范性突破。

夏志清在其〈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作品极力表现道义上的使命感，无论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或散文家都把自己看作是人心和社会改革家。^④这种感时忧国的传统，事实上可以在儒家思想中得到印证。^⑤

虽然“五四”是一个反传统的运动，但其内在精神却和传统处在一个“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关系。^⑥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是不可改变的，它是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历史分水岭，作为现代中国研究中广为探究的课题，“五四”分期其实已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这个分期强调中国的地位是通过现代化而得与“世界”并列。文学要现代化，必须用白话文写作，并辅以严谨的布局、结构和人物描写等。^⑦“五四”理论家所呼唤的，严格说来并不是什么新的文学定义，而只是将文学自传统的从属位置中独立出来。他们要文学脱离“道”的束缚，以取得“文学就是文学”的回归。

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五四”文人对文学的理解和西方现代的意义相

③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总，1987），页 27-78。

④ 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页 79-106。

⑤ 有关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学所扮演的角色，可参阅 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06-16.

⑥ 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页 93-107。

⑦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作品集 3》（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页 55-73。

去甚远，“五四”文人的观点虽然也包含西方文学的解读方法，但渗透更多的是西方思潮中的人道主义。贴切地说，“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唯美主义，而是将传统的“道”重新解释。以阐述传统价值观为目的的“道”换成另一个“道”，“五四”作品的特征是文字中流露出爱国热情。他们忧国忧民的热情，对时局加以批判和暴露，为被侮辱及被压迫者说话。为现实人生的不公不义而抗争。对“五四”文人来说，文学是一种社会变革工具，文学是事业，不是娱乐。

这种功能的取向在1902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已见端倪，在这篇作为文学革命前驱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小说具感染读者、移易人心、改造社会的功能。^⑧这种实用的角度后来不断地被深化，加上中国的内忧外患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种信念的延续力就更强了。

也因为如此，写实主义成了中国的主流就不足为奇了。三十年代后，写实主义这个名称虽然由左翼作家改成现实主义，但是这个特色依然不变。写实/现实主义作家信仰文字达意表象的模拟功能，他们力求客观无我，为人生而艺术，但一股原道精神总是呼之欲出。因此我们并不会觉得奇怪，在当时马来亚的文人，不管是提倡中国意识的，或提倡本地化的，都相信文字的无比力量。他们延续儒家的人世传统，强调人道胸怀及控诉精神。只不过一个的道德感要文学创作者关心中国，另一个则是要创作者关心本地。究其极，他们都是五四时期“感时忧国”的传人。

独立以后，围绕在马华作者和中国或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问题还是很多。1972年赖瑞和在台湾发表一篇论述为什么许多留台生最后选择长久定居台湾的文章。赖的文章触发了认同转向问题的讨论，回应的除了留台的马华作家，也包括许多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台作家如翩翩（张错）、刘绍铭等人。最值得注意当然是当时在西雅图留学的林绿现身说法，他认为他在“马来西亚时是不成熟的，而且尚未定型，赴台后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就是从侨生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因此演变下来，就渐渐淡忘马

^⑧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香港：天行出版社，1972），页271-76。

来西亚文坛了。”^⑨这时候的讨论已将马华文学是否是侨民文学的问题改成马华文学是否能自成主流或只是中国文学支流的对立。当时年仅十九岁的赖瑞和有感而发地说：“我以为，一个作者，如果真的要严肃的去搞中国文学，或者要在某种中国的传统下写作，他迟早会发现，马来西亚实在不是一个适合的地方。我所持的理由是：这里的社会不是一个纯粹中国人的社会。”^⑩后来，温瑞安重提这个论点。温瑞安的观点更是斩钉截铁，他的理由是没有中国文学，便没有马华文学。而马华作家使用的仍是标准的中国文字。如果一味强调马来西亚化，必将不见其利，只见其弊，结果是“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价值，又无法蕴含新的文化价值。”^⑪

温瑞安的观点仍然是延续着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所引发的问题开展。温瑞安的观点显现了政治认同和文化取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在尝试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定点时，借用林建国在其极有启发性的〈为什么马华文学?〉中的话，温瑞安以“无比的勇气构筑‘乡愁’和乌托邦。”^⑫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定点也是一样富有儒家色彩的，温瑞安的儒家心态使他不能停留在“文学就是文学”的美学思考，文学最终溢出美学的范围，大一统的心态使到许多作者强调文学的发展必然是百川汇海。

将马华文学当作是中国文学支流的论述一遇到政治现实就不免碰钉子，特别是那些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强调本地色彩的作家，对类似的观点当然不以为然。这种观点容易受到攻击，几乎是想当然尔的事。^⑬

但是强调本土化，显然只是铜板的另一面，它只是大一统思想论述的

⑨ 林绿：《林绿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页57-61。

⑩ 赖瑞和：〈“文化回归”和“自我放逐”〉，收于温任平等：《马华文学》（香港：文艺书屋，1974），页154。

⑪ 温瑞安：《回首暮云远》，（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77），页12-5。

⑫ 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页110。

⑬ 参阅叶啸：〈抉择一条要走的路——马华写作者所要认清的处境和归向〉，《蕉风》，第303期（1978年5月），页34-8。

变奏，严格说来都在同一个语境中展开论述。这个论述的弱点是将文学的建基点从实用的角度加以考量，结果是复杂的问题被简单的二分法划之，使它一开始就无法和在逻辑上相反的“中国文化”形成任何张力，许多议论没有注意到文化发展的迂回道路，忽略了两者渐行渐远但又相混杂的张弛关系，因此自然无法发挥其理论上的冲力。

这个问题到了九十年代并没有完全解决。九十年代较为突出的是断奶的课题。参与这个讨论的作家包括黄锦树，林建国、陈雪风、温任平、安焕然，张光达等人。支持断奶论的林建国、黄锦树在论证这个问题，主要是希望马来西亚可以摆开大中国主义者论述，“因为马华文学不可能在概念上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⑭这个学术议题，却使许多人情绪失控，被看成简单的“脱离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渊源”，^⑮林建国、黄锦树因此成为“众矢之的。”^⑯两者从不同的认知角度论述意见，没有交锋在所难免。但是引发两者之间论争的源头仍然是中国——不管是作为一个文化幽灵，或是政治象征，中国仍然是许多马华作家摆不开的形象。

因此一个问题很自然地产生：马华文学是独特，或是马华文学有独特身份？这独特身份，它的功能是和谁划定差异的界限？这差异的界限是否能够划定？在急于肯定自己的独特身份的过程里，是否越察觉自己身份的不稳定？抑或在企图划定差异的同时又强化了同质？呈现了身份稳定但不独特？

2、马华文学的政治性

马华文学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受到歧视，英国殖民地政府不重

^⑭ 林建国：〈再见，中国：断奶的理由再议〉，《星洲日报》，1998年5月24日。有关“马华文学不可能在概念上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的论述，另见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页89-126。

^⑮ 陈雪风：〈华文书写和中国文学的渊源〉，《星洲日报》，1998年3月1日。

^⑯ 温任平：〈与林水榭谈“断奶”与“影响焦虑”〉，《星洲日报》，1998年3月29日。

视它，马华文学作者一向以来就属于默默耕耘的一群。独立以前，当时的作者并不需要解决政治认同的问题，因此题材是否本地化，纯是个人的选择。独立以后，效忠的问题开始变得尖锐了。马来西亚华人为了要和中国划清界线，避免让马来族怀疑，因此不断强调自己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不由自己地遭受一个被“定位”的过程。

自从马来文化大会在1971年8月议决了国家文化概念以后，政府不将马华文学当作是国家文学的立场就昭然若揭。^{①7}从官方的立场来说，马华文学被排斥在外，在于其书写语是华语而非马来语。马华文学作家看到马来文学在语文局的设立以及各种官方文学奖颁发的鼓励下一日千里，对于马华文学不被鼓励，难免有不公平的感触。^{①8}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华文学称号的确定可以促成一种整合意识，这样的政治意义是不辩自明的，因为只要政府承认马华文学为国家文学的一环，那政府就有义务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马华文学也就可和马来文学一起并驾其驱了。

但是这样的提法背后却有一种政治/审美二元对立的逻辑。何谓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化？何谓“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用文字来说，马来西亚华人应该有自己文化特色的论述表面上看来易如反掌，政治人物经常大言不

^{①7} 国家文化大会在1971年8月16日至20日在马来亚大学召开，大会讨论了60篇论文，内容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设计、戏剧、技艺、建筑等，讨论的内容专注集中在马来文化，在参与者大约一千名中，只有几位是非马来人，作为大会的点缀。这个大会议决了三项以后政府所依据的国家文化政策。这三个概念是：一、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二、其他适合及恰当的文化原素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原素，但是必须符合第一及第三项的概念才会被考虑。三、回教为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原素。国家文化概念固然有许多含糊的地方，但整个立场却一目了然：国家文化，就是以马来群岛原住民及回教文化为主流。这个政策的重点是以单元消除多元。马来精英显然认为，如果其他族群可以向马来文化认同，就不会有族群纠纷，这和以后马来人常提及的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是一脉相承的。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见何国忠：《独立后华人文化思想》，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1998），页45-86。

^{①8} 年红：《从马来文学高速成长中吸取经验》，《为新一代开创文学新天地》（南马文艺研究会，1986），页63-72。

狂妄自定论。但是在实践来说，对中华文化的承受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止？在什么地方增加马来西亚化？文化的切断点在那里？恐怕就不是文字可以说得清楚的。从文化的角度思考，一个作家南来，然后在本地定居，又或者一个作家定居马来西亚，过后移居到国外，我们又如何将他们定位？倘若文学只有政治上的价值，这样的提法当然是顺理成章。但文化的发展本来就是自然的，强求不得。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的本土文化之间有极大的模糊地带，我们最多只能在已完成的作品中，做历史性或文学批评式的检讨，没有可能要作者创作前在中国性和马华性之间做一个选择。

这种文学政治化当然不是马华作家自愿的选择，马华作者内心隐藏了几许无奈。虽然如此，处在被动位置的马华作者迎接无力却也是事实，学术的自省和反思形不成气候，整体给人一种感觉，作家们根本无力辩护。

独立了四十多年，政府看来并没有支持马华文学的意图及迹象。但是马华文学中的“马”却在追求成为国家文学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强调，作为作协第二、三任主席的方北方如此开药方的结论是不足为奇的。他说：“马华文学……除写作媒介工具的华文，其他如构成作品的思想感情以及事物的本质，已与发源地的中国无关了。”^①作为作协第五届主席的孟沙说得更为直接：“马华文艺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摆脱中国文学的附庸的地位，是道道地地的国家文学。”^②但是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此岸是否有可能过渡到彼岸？马华文学是否有能力在一个事件的各种矛盾对立的描述之间来回游走？又或者它只是一场政治辩论的附庸。

马华文学是国家文学的提法当然值得谅解。但这种论述开展的同时，却在无意中将马华文学制造成一个刻意创造的、精心编码过的被动位置上。这种状态使得马华文学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马华文学的最大问题是提者往往将问题以总体性或终极性答案一笔带过。我们在不断探索之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上进行追问：马华文学是什么？马华作家是什么？我们是谁？

① 方北方：《看马华文学生机复活》（加影：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1995），页10。

② 孟沙：《马华文学杂粹》（八打灵：学人出版社，1986），页26。

我们为谁写作？

当黄锦树和林建国认为马华文学指的应该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以便和大马华人史相契合”，^①并使“马华文学成为更广延。更具动力和颠覆力量的概念”时，^②显然希望在不利的政治语境中寻求突破。但是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角度来看，这个观念不容易被认可及实践。原因是华人写的非华文文学和华人写的华文文学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相对于国家文化，这两者可能都是被排斥在边缘的位子，两者对国家的许多问题都有极大的不满。但是，文化认同方面，英文或马来文作者接触的书物都是非中文，他们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绝对比不上中文创作者。两者显然别有怀抱，甚至是不相来往的。^③因此，如果我们将马华文学定义为华人文学，那我们显然还得将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寻找另一个涵盖语，要不然许多作家可能更飘摇无依了。^④

但是不管如何，“马华文学”的政治性已是一个不能摆脱的事实。较令人担心是政治效应使马华作者将这个问题化约成简单的道德选择。许多马华作家已经习惯将本地色彩特殊化起来，其地位更被夸大到走出文学的领域。

地域性的强调，使到中学课本在1986年修订后，增加了许多以本地作为书写背景的文章。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在课本编写过程中，由于有本地色彩的经典不够，以致许多课文是临时抱佛脚请人撰写，或是随意编选

① 黄锦树：〈“马华文学全称：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页26。

② 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页109。

③ 1999年7月25日晚在八打灵星洲日报总社由美国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润华及李倬然主讲的一个讨论会上，谈到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李欧梵建议本地华文作家注意一下以英文创作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作为主持人的傅承得，回应了一句颇可以代表马华作家心态的话。他说：“我们的问题太多了，无暇再去关怀英文作家的。”

④ 现任作协主席云里风就是其中一个坚持马华文学“必须是以华文书写”的人，见云里风：《文艺琐谈》（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页31。

进去的，水平值得怀疑的作品比比皆是，而另一方面，加强中学课程中的马华文学的份量的呼吁，却从来没有停止过。^⑤

我们知道，教育是集体意识的传递，事实上也是确立这种意识的最有效工具。本地化的强调无疑使到政治可以和爱国挂钩，这种唤起我们“效忠”的意识，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政府所认可的论述方式，也是政府尝试建构的历史，它的功利主义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马来西亚的现实主义和官方立场合流，所能解决的比不能解决的问题更多。一方面，马华文学在种族思想弥漫之下仍然徘徊在国家文学的门槛之外。另一方面，画地自限，将课本的水平降低，取法于下，故得其下下，这无疑使到提高社会华文水平的理想更难企达，长远来说当然也破坏文学水平的提升。

3、马华文学走入国际

在强调“本地化”的同时，马华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坛的关系究竟又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出于政治的考虑，当代中国的作家也非常识趣地不将马华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支流。1986年在中国举办的一个海外文学研讨会里，中国作家都有共识：虽然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历史反映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但现在已经不是中国文学的分支而是扎根当地的民族文学之一。^⑥

这种为马华文学“定位”的文章俯拾即得，我们不妨拿其中一次在吉隆坡举办的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中的一篇文章作为参考：

^⑤ 例如吴恒灿：〈华社的心有千千结〉，《南洋商报》，1999年8月8日。

^⑥ 乐黛云：〈从世界文化交流看华文文学研究〉，《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第三届全国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社，1988），页404。

自从马华文学开始以“此时此地”为背景，反映当地各族人民生活，它就具有本土文学的个性，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尤其在主要的反映华族，以及华族在与其他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各种生活遭遇，更显著地体现出这种传统的独特性。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融合或浸润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独立、民主、自强的民族精神之中；融合或浸润在对中华文化的寻根和承传之中，同时又是为了建设这样一种崭新的独特的文学：适合本国华族及其他民族人民需要，具有本国华族生活背景及异国风情特点，并能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建设服务。^⑳

上述的论述告诉我们，马华文学已经在国际上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号。但是建构的理由一再被重复之下，看来更有八股味了。^㉑这样的论述事实上不是批评马华文学的优劣，探讨的问题不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而是基于另一种信念，作家若不能为他的时代留下片纸只字的见证，才是真正的遗憾。这种确定马华文学主体性的看法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自从马华文学开始以‘此时此地’为背景”，“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是否有必要确立“文学传统”？把文学和“现实”紧紧地扣在一起，会不会和五四最喜欢的目标“文以载道”同样守旧？如果“传统”被确立起来，那作家会不会变成“中国现实主义”遗产中的另一个注脚？这样做岂不是消除了马华文学众声喧哗的可能？

这种非文学的观点被认可，喻示了马来西亚作家写作的困境。他们把自身想象为某种民众的代言人。但问题在于这种“身份”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式的意识形态幻想，一种来自于对语言的幻觉。它使人在盲视中

⑳ 马相武：〈当代马华小说的主体建构〉，戴小华、尤绰韬编：《扎根本土，面向世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98），页19-20。

㉑ 随手再举两篇有类似语句的文章，黄万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特色〉，《蕉风》，第465期（1995年3/4月），页54；杨怡：〈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马华作家》，第7期（1998年4月），页5。

失掉了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它把对语言的掌握视为对现实的掌握。并没有什么人赋予知识分子代言的权力，所谓代言性的写作不过提供了作者自身意识形态的表达而已。^{②9}

反抗这种叙述方式最力的，莫过于李永平的《吉隆春秋》。这本书引起注目的原因极多，其中之一是作者提供了一个背景模糊的地方。李的小说背景只是一个符号，吉隆镇既有南国情调，也富有北地风采。是台湾、是大陆、还是大马？让许多人充满了好奇。李永平的写法不可小觑，他显然要跨越地域性的层次，一方面除了嘲弄原乡情结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挑战“马华”文学的定义，李永平的作法，使到文学本身的特质得以显现。在《吉隆春秋》里，地域性的区分是毫无意义的，作者模糊了这个界限，这是一个典型的“唯有用文学的词汇才能解决文学的问题。”

但是李永平只是一个少数例子，这种只能以“文学论文学”的思路并不足以动摇根深蒂固的“马华”特性。而李永平的反抗，也在同时显示他内在的焦虑，即使是李永平自己也摆不开地域性的观点，他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并不否认《拉子妇》是马华文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给后来者的忠告：

不要走我的路，太痛苦……我希望他们以后回马来西亚好好创作，写马来西亚的风土民情……不要像我一样写台湾。作家应该写他们最熟悉的事，否则自讨苦吃。^{③0}

李永平《拉子妇》以后的作品是否已成功的摆开马来西亚特性，我们可以不必在这里讨论。困扰我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刻意不写马来西亚呢？李永平这番话让我们免不了有这样的联想：“马华文学”特性的形成，事实上也印证了马华作家的边缘心态。

^{②9} 这个观点借自张颐武对池莉的小说《热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的评论文字，张颐武：《人民记忆与文化的命运》，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页250。

^{③0} 《光华杂志》，1998年8月号，页110。

李永平走入主流的方式是避开其马华性，这种孤独上路的方法，根据李永平的说法，必得“加倍努力”，^①可见其过程的艰辛。事实上，边缘和主流的形成，牵涉的是主导权和解释权的文字游戏法则，马华文学批评圈子成不了气候，因此也无形中失去了“解释权”，向外寻找“认可”于是变成一个具体表征。如果我们研究这十多二十年来“马华文学走入国际”是如何组装起来，我们即清楚地发现，所谓马华文学走入国际，只是马华文学主体在其介入主导文化时的“边缘”化。

走入国际当然有其重要的历史动力，这可以扩大马华文学的阅读人口，对许多长期感到受政府歧视的马华作家来说，走入国际可以使他们得到“强有力的兴奋剂”。^②可是它所引发的问题却让人不安。这一、二十年来流行的后殖民理论并没有很好地使到马来西亚作家反省马华文学应有自主性的叙述观点，马华文学的论述从没有想要摆脱中国论述的修辞方式。恰恰相反，受中国作家的“指正”已变成一种光荣，而这一点也是马华文学发展的悖论，一边追求本土性，不愿附庸中国，另一边则不断地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

所谓的认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无可否认，这一、二十年来，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常和台湾、中国等地的作家来往，这种交流，使到许多马华作家的作品被注意。从1991年开始，每隔二年的世界华文文学会议，都有马华作品被提出来讨论。极为遗憾的是被讨论的作品，有许多是极为粗糙的，也因此才有人批评中国作家逢人就赞的现象。也就是说，马华作家因为这个“马华”而得到特别的优待，被人过分“鼓励”和“看重”了。这种现象，就连许多中国作家也觉得应该检讨。古远清一针见血地批评许多中国批评家“资料掌握不全面”，“抓到什么就评论什么。”这位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华作家的论述影响了中国学者，马华作家到中国研讨会参加的论文，往往成为中国论者的“第一手资料”，以致“表扬稿”处处可见。^③

^① 同上。

^② 云里风：〈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蕉风》，第448期（1992年5/6月），页2。

^③ 古远清：〈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戴小华、尤绰韬编：《扎根本土，面向世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98），页108-16。

我们可以再将问题推得更远一点，即使有一些作品获得认可，那只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表现出色，与他人有什么相关？为什么要突显“马华文学”？

的确如此，基本上，所谓走入国际，只是自我勉励的话，确实的情况是马华文学在许多国际评论家或作家眼中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领域。在《亚洲周刊》所推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除了李永平的《吉隆春秋》这部还勉强有点马华特色的作品名列第四十以外，名单中见不着“马华文学”。^④当然有许多人认为不必对这个成绩认真，因为“大多数评审委员不太可能读到东南亚的作品。”^⑤就是这个“大多数评审委员不太可能读到东南亚的作品”恰恰证明了马华文学走向国际只是一个梦幻。这种当头棒喝，就如年轻作者钟怡雯编辑《马华当代散文选》时有感而发的话：“我们不需要任何批评的优惠，马华散文必须在公正严苛的、与中国和台湾相等的标准下，接受研究与批评。这才是马华文学加速成长的途径。”^⑥

4、苦恼的马华作家

独立以后，华人在各个领域节节败退。特别是华人文化在自我发展方面受到百般刁难，使到许多华人之间出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不公平的对待，华人有百般的感受。这种文学题材对我们来说不会陌生。

因此，温瑞安到台湾去的时候，投入一个完全属于中华文化圈子的新天地而雀跃万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温瑞安的作品，也许被批评为过分向往中国，但我们无须从政治的立场批判这样的一种态度，甚至也不必沾沾自喜于温瑞安在台湾建立神话王国的失败。温的表态并无碍于他投射马来西亚新生代的想像氛围。甚至前引的林绿也一样，李永平放弃了马来西

^④ 《亚洲周刊》，1999年6月13日。

^⑤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6月20日。这个由张曦娜所做的报导，访问了余秋雨及新马文学界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⑥ 钟怡雯：〈序〉，《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页12。

亚的国籍也应作如是观。^{③7}这种身份归属的探寻已经跨越无数的年代，并且持续着。九十年代受人刮目相看的马华作家及评论家黄锦树曾有这样的反省：“就我这第一个在出生地时属于台湾宣传中的隐形族群——“华侨”，在台湾求学时是侨生、办证件时是外国人、打工时被逮到是非法外劳、假使入籍则变成“祖籍福建”的外省人第一代的“海外”留学生……。”^{③8}在八十年代台湾出现“台独”意识以及本省和外省的争论，使到认同问题更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难以避开的思考，这种思考的张力比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二重思考更加复杂和更具挑战性。文化认同问题因此变得更加尖锐。马来西亚华人作家要如何找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的探寻当然得置放在当前马来西亚的时空才可显现它重要的意义。对于马华文化、政治发展的诸多不满一直是许多作者处理的题材。潘雨桐、小黑、傅承得、方昂、吴岸等作家都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作品。不管怎样，马来西亚总是一个让马华作家魂牵梦挂的地方。李永平就有这样的叙述：

我吃马来西亚的米、喝马来西亚的水长大，当然对那块地方有感情，但是国家认同是另外一回事。^{③9}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心路历程当然也特别起来。许多作者，尤其是年轻一辈作家的成长过程，大体可以用李欧梵论述鲁迅时所用的“一连串的心理危机。充满了困惑、挫折、失败和心灵探索的彷徨”来形容。^{④0}林幸谦以下的文字：

在追寻中，我发现人类原本就没有家乡，乡园只是一种无可理喻

^{③7} 《光华杂志》，1998年8月号，页110。

^{③8} 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页3-4。有关黄锦树在马来西亚所引起的旋风，见何启良：〈黄锦树现象的深层意义〉，《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9），页109-15。

^{③9} 《光华杂志》，1998年8月号，页110。

^{④0}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

的幻影；人生原本就注定了漂泊，本体论的流放就是这样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每个人原是一座孤岛，我们注定无家可归。^④

这种畅谈“无家可归”的感情，绝对不会让我们觉得陌生。虽然这种超越时空限制，观照永恒的人性与历史，常常会让“本地意识”色彩极浓的作家觉得距离“现实主义”颇远。但是我不应该对这样的论述视而不见。林幸谦的文章，借用王德威对原乡题材的论述：“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启动作品力量叙述的关键。”^⑤林幸谦的作品，秉持了现代主义的精神，继续与传统对话。类似他这样的作家不只要找回失去的文化乡土，也要找回落地生根的乡土。这种“文化乡愁”本来就是马华作家经常处理的题材。“现代”的定义众说纷纭，但都指涉对时间断裂的危机感，对主体失落的乡愁感怀。马华许多现代作家不断在纸上重回乡土，归纳各种可能的因素，解释眼前的困境。很显然的，当现代主义来到马来西亚，已无可避免地被本土化了。从温瑞安、温任平，到辛吟松，都有这样的意义蕴涵。^⑥

上述的讨论说明在许多作家的血液里，中华文化无疑是他们精神的源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不管马华作家在中国、在台湾或在马来西亚，其马来西亚的经验已是活生生的记忆，目前的所在地，只是所谓中文普及性环境强弱不断易位的游戏，并不能影响文学创作者的身份与作品的表现。

但是持续追求主流论述的心理，却使到马华作者受到无穷的干扰。马华文坛的整体表现和中国大陆及台湾相比，常常令许多作家觉得相形见绌，这一种对比是不是需要是一回事，但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在精致化的表现却让许多作家耿耿于怀，这种从文学创作导致对整体文学的关心，对马来

④ 林幸谦：《狂欢与破碎》（台北：三民书局，1995），页35。

⑤ 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小说中国》（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页250。

⑥ 以上的论述是从王德威分析台湾乡土文学而得到的启发。王德威：〈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页159-80。

西亚的作者而言是正常的事。

事实上，“马华”作为一个文化观念有其重大的凝聚力。现实主义者在这方面的例子当然很多，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改革社会的工具，因此文学在这里发展不起来，当然使他们感触良深。^④即使是被批评为不关心社会和现实主义对立的现代主义者，也有许多类似的话。温任平有这样的评论：

回顾二十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竟觉愤怒之情膺腔。二十年了，我们在探索、试验的混沌状态跌撞向前足足走了五分之一个世纪。这二十年来我们仅仅拥有不超过二十位优秀的诗人，不超过十位有分量的小说家，不超过五位还算称职（还不能算好）的小说家，我们的心情宁不悲愤？^⑤

这种对文学的创作热诚溢出对整体文坛的关怀，并且使到自己是文化批判者，是马华作家的特色。即使是到了九十年代，这种现象仍然没有休止。批评马华现实主义最力的黄锦树，也充满了这样的关怀。黄锦树说他批评许多马华作品，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所造成的。^⑥可见为“马华文学努力”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思想纹路。

5、马华作品走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把某一种作家，按居住地归并在一起，指认他们的写作活动有某种相似性，对他们居住地的地缘文化特性进行一种缝和，如中国北方作品多豪放，而南方作品多纤秀之类的概括，是许多批评家惯常的做法。这当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必然”的根据，只是为了方便批评家的工作，或者使其批

^④ 例如见碧澄：〈从写作人的角度略谈马华文学的前景〉，傅孙中及赖观福编：《文化十年：华人文化大会十周年纪念活动论文专辑》（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1995），页77-84。

^⑤ 温任平：《愤怒的回顾》（安顺：天狼星出版社，1980），页14。

^⑥ 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页4。

评变得更系统化。当然，无可否认的，作家在置于相似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之下，生存在相同的“文化空间”之中，作者的文本出现“共同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归纳当然可以让文学批评多一个面向度。

也因为如此，我无意否定马华文学作为一个文化标签，恰恰相反，这个标签已是许多人认同的基础。任何的批评都会依据重复的某种组合，这可能是专指内容，也可能纯粹只涉及技巧。没有这种共同点，不仅批评无法做，整个世界将是不可知的一片混沌。换句话说，批评家所做的只是厘清文学里头存在的问题。

只要马来西亚目前的政治情况没有改变，华人文化的发展应该也会维持相同的面貌，而华文文学进程大体也会如此：有人仍然非常投入创作，有人仍然将文学当作生命的寄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文人对马华文学的关怀和认同将继续存在。Richard Rorty 分析“团结”（Solidarity）这个观念时指出：

就以美国大城市里年轻黑人无助和悲惨的遭遇为例。针对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这群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会不会说我们帮助年轻黑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我们也许这么说，但是，从道德上或政治上，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应该是将他们描述成和我们同属美国国籍的同胞，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愤怒，何以我的同胞竟然活得如此绝望。这些例子主要是说明若要达到团结目的，我们一定要有“我们是属于这一个群体”的观念，而这个“我们”一定要指涉某种比“人类”更狭隘，更具地方性意义的东西。唯有如此，团结感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④

随着中国大陆、台湾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加上影响马来西亚文坛极大的台湾文学本土性意识的快速成长，马华意识只有膨胀，不可能萎缩。以后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虽然将有大部分仍然抛不开文化乡愁、对本国政

^④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1.

治不满，但是“马华”绝对是他们不得不重视或思考自己定位的一个重要座标。

三好将夫在〈反对种族中心主义〉中提到日本文学时有这样的一段话：

日本文学正象其他任何其他国家或区域的产品，只是当它与时空的界限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许十分显而易见地是“日本的”的；但它的构成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④

“马华文学”引起的歧义显然比日本文学更多，但它的构成也一样“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我们重新在历史和政治语境中检视马华文学的处境，将马华文学重新拆解，重新审视“马”、“华”及“文学”，主要是指出马华文学发展的一些盲点，但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或政治的，因为它引起焦虑的原因更多是在文化或政治的认同上。

属于马来西亚国籍或是有马来西亚经验的作家，有许多自己独特的课题，文学的题材当然因此千变万化。而马华文学概念的提出，除了解决政治和文化问题以及为文学批评家寻找更多的研究题目，其他看来都不那么重要。文学不必是文学史的总结，作家不必依照评论者的指示行动，恰恰相反，作家永远都可以超出史家或政治家的见识。也因为如此，本文虽然扣紧了两个令马华作家困扰的课题——即文学在政治的语境下所受到的干扰，以及马华作者在本土化和挥之不去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困惑——但本文最终的目的却希望文学创作者可以把观察世界的视域从一个狭窄一专的基点移为多重多元的视点。换句话说，文学创作者要注意的是多一点的“文学”，少一点的“马华”。

^④ 转引自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页11-2。